



耕耘集

文艺评论集

责任编辑 彭鹤松
封面设计 马荣华
封面题字 冯济泉
技术设计 苟新馨

耕耘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文学理论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97千字

印数 1—2,053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431 定价: 0.74元

BE75 128

I06
19
2

耕耘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文学理论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A 659039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本文艺评论集，所收文章大都是我省报刊七七年以来发表过的。

本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入了我省在创作上较有成就的老、青年作家创作经验谈；第二部分是我省文艺理论工作者对创作的一般规律的论述，及对我省作家、艺术家作品的评论；第三部分是文艺随笔。

目 录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	蹇先艾 (1)
感受·理解·表达	
——关于《乡场上》的写作·····	何士光 (7)
挫折,成功的阶梯·····	叶 辛 (13)
我是怎样写《呼声》的·····	李发模 (22)
生活,美	
——创作随想·····	雨 煤 (29)
谈创作中的暴露问题·····	林钟美 (34)
关于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探索·····	虹 闻 (46)
摆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林钟美 (55)
浅议文艺的社会效果·····	杜 郁 (60)
爱情描写中的几个问题·····	季 泉 (65)
四项基本原则与“双百”方针·····	本 忠 学 德 (71)
艺术中的美与丑·····	何大堪 (76)
略谈繁荣民族新文艺·····	卓 钺 (81)
漫谈科学幻想小说·····	建 安 (85)
题材琐谈	
——学习鲁迅论题材札记·····	黄大荣 (89)
短篇小说的开端和结尾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	袁 希 (92)

何士光和他的短篇小说·····	蹇先艾 (101)
涧水清流化诗情	
——试论廖公弦诗的艺术特色·····	雨 佳 莫 漠 (108)
长教源头活水来	
——读戴明贤同志的几篇儿童小说·····	张万明 (118)
崭露头角的新人·····	廖公弦 (124)
朴素中见深刻	
——读张克同志的诗集《征程集》·····	余 化 (127)
彝汉团结的赞歌	
——评黔剧《奢香夫人》·····	郭汉城 沈 尧 (132)
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王 梧 杨思民 (137)
评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	张 灯 (145)
《基度山伯爵》情节结构的特色·····	欧阳发 (152)
略论李清照的词·····	岳国钧 (163)
晚清文人莫友芝·····	刘之侠 熊易农 (178)
读宋吟可的画·····	王树艺 (191)
《王树艺木刻选集》序·····	李 桦 (195)
彩笔绘山河	
——读孟光涛的画·····	杨长槐 (198)
根深叶茂	
——谈陈恒安同志的书法艺术·····	陈训明 (200)
电影·人民性·党性·····	韦 翰 (204)
电影的社会效果·····	涂尘野 (207)
电影·人民·····	乙 一 (210)

漫话插图·····	肖体礼(213)
略谈《乌鸦与麻雀》的艺术特色·····	王 正(216)
看电影《蔡文姬》随笔·····	杜 郁(220)
彩色斑斓，富有新意	
——英国彩色故事片《孤星血泪》观后·····	耕 芸(224)
凶狠的鹰犬，完美的形象·····	伊 星(227)
奇与巧	
——浅谈香港影片《生死搏斗》的艺术构思	
·····	孙惠良(231)
《一江春水向东流》琐谈·····	兵 捷(236)
变形以传神	
——从《黑豆》说开去·····	弋 人(241)
夜读偶拾二题·····	文 蒙(246)
贵在实事求是·····	陈锐锋(250)
努力揭示生活的本质·····	王鸿儒(252)
这一耳光	
——浅谈《天云山传奇》中的一场戏·····	龙忻成(257)
婉约与豪放·····	卢惠龙(259)
想象片谈·····	化 石(261)
短论两则·····	单洪根(264)
夕照·青山·····	朱 曦(267)
文学欣赏浅谈·····	汤国铨(269)
福楼拜式的训练·····	黄建春(274)
维纳斯断臂之谜·····	石延寿(276)
从打死依雅古谈起·····	吕 笑(279)

谈“闲笔”	袁 远(281)
谈画眼睛	胡光芬(283)
简洁 明快 凝炼	陈茂林 肖纪光(286)
“江郎才尽”小考	刘德一(288)
“敲门砖”及其他	辰 雨(291)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

蹇 先 艾

从1925年起，到1949年为止，我总共写了一百来个短篇：可存的不多。远在中学时期，我就爱好文艺，开始学习写作，勇气倒是有一点；基本功其实很差，思想、艺术修养与生活的准备和积累非常不足；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表现手法，完全不懂。我和有些在北京游学的青年一样，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见猎心喜，信笔写了一些思念故乡、追忆童年的散文和似是而非的短篇小说（其中也有几篇是以青年的苦闷和恋爱为题材的），正如1935年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我们早期习作概括的评语：“写出了胸臆”，“隐现着乡愁”。我居然被列入“乡土文学”作者，这是始料所不及的。那些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文字尽管简朴，也有热情；但其缺点不只是人物平常，事情琐屑，技巧也是十分幼稚的。这固然不算什么耻辱，毕竟是名副其实的习作。

三十年代，我从大学毕业以后，长期以教书为业（后来又兼在一个图书馆工作），生活既固定，生活面又很窄；不过每年我总要利用寒、暑假去各地作短期旅行，或者回到故乡（贵州遵义）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生活。我并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当时我们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根本

没有到工农群众中去的自由，只能偶尔偷偷地和工农或其他劳动人民有所接触，听他们讲了一些他们的悲惨遭遇，使我深受感动，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与同情，逼着我非把它们写下来不可；不写就觉得不舒服。有些是真人真事略加补充，也有些是我在生活中所见的同类的人和事概括拢来的。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立足点稍有转移，开始摆脱了身边琐事，选材逐渐广泛地转向劳动人民。慢慢地学习了如何比较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比较鲜明地描绘事件的环境，如何提炼主题思想和情节，根据实际生活来创造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在生活中学习和记录群众的语言。我也写出过几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谜》，《春和客栈》等；但是有一些作品，只抓住了某些表象，没有洞察事物的本质，人物也仅仅画了他们的脸谱。原因是我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解决，对生活又没有深入，理解、分析水平不高，反映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难于达到真实、深刻了。

我学写短篇小说，一开始就受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很大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北京师大附中的国文教员夏宇众先生，他很早就给我们选讲了鲁迅先生和叶绍钧先生的小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1923年我把鲁迅的《呐喊》和叶绍钧的《隔膜》读了两遍。后来，接着又读了鲁迅的《彷徨》和叶绍钧的《火灾》、《线下》等几个集子。我读鲁迅的小说时，如获至宝。我觉得他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特别深刻，有的作品写知识分子，有的写农民，既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又反映了下层社会的不幸，爱国主义的思想跃然纸上。有些短篇，对光明的未来还作了肯定，并对革命表示了殷切

的希望。他的小说，短小精练，的确做到了“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没有拖沓冗长的描写。无论是刻画人物或者描绘环境，手法都是超群出众，寥寥几笔，便简洁有力地勾勒出了小说的场面、背景，只用三言两语或者一两个姿势、动作，便活灵活现地表达出一个人物突出的习性和特征，完成了艺术典型的创造。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典范，这是举世公认的。

叶绍钧熟悉江浙一带的中小学教育界的生活，他的早期的短篇小说，讽刺旧社会，嘲笑小市民，对小人物深表同情，文字朴实，注重语法、修辞，结构紧凑，他也是我们初学写作时爱读的作家之一。事实上，鲁迅的作品给我的启发更大，我师承他也更多一些。

在外国作家中，我很喜欢莫泊桑和契诃夫，读得最早的是莫泊桑的名著《项链》。在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和赵景深翻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出版之前，我已读过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几本英译选集。莫泊桑以故事情节见长，反映了1880年以后的十年间巴黎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思精巧，善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激发起读者的感情。契诃夫描写十九世纪俄国黑暗时期的丑恶的真实生活。他厌恶庸俗。高尔基认为他“在灰暗的‘平庸’的海洋里，发现了在滑稽的外表隐藏着悲惨的东西。”他希望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革，用心良苦。他们各有千秋。我有点偏爱契诃夫，他的短篇，形式短小，富于幽默和讽刺，有鞭打，也有怜悯，意味深长。我在学习写小说时，也受了他一些影响。1936年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我发表过一个短篇《泄》，就是拟契诃夫的。

有好几年我都是在图书馆工作，使我有机会涉猎了较多的中外作家的名篇，也读了一些高尔基和东西欧作家的作品，不过都是略读，没有精读，得到的借鉴不算多。我应当感谢在学习写作期间，前辈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给我的诱导和帮助，孙伏园、王统照、徐志摩、郑振铎、叶绍钧、胡愈之、傅东华、巴金、靳以、沈从文、王鲁彦、熊佛西、李健吾等同志（有好几位已不在人间），在他们主编的副刊或者杂志上发表过我的习作，有些同志还把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编进丛书或者介绍给书店出版。没有这些前辈和同辈的扶植和帮助，我肯定不会坚定不移地走上文学的道路。文艺新芽必须由园丁们在各种文艺园地上加以培育，才能茁壮成长，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我的短篇小说取材于贵州的较多，因为我对故乡的人民生活、语言和风土人情一般比较熟悉，虽然对有些题材写来并不见得都那么得心应手；但我坚持一条：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不要勉强去写。贵州是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得最久的一个省份，官绅勾结，压迫剥削，军阀横行，抓兵派款，横征暴敛，民穷财尽，卖儿鬻女，解放前劳动人民一直过着苦难重重的地狱生活。我既有耳闻，又有目睹，我在小说里总是想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和滔天罪行以发泄我的愤怒；但是在我的作品里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只停止在对旧社会腐朽黑暗的憎恨和无情的抨击，却没有指出前进的道路。我所写的那些故事，大多数是令人愤懑和悲痛的，因此调子就往往显得有些低沉，使人读后感到沉闷和压抑，这是我应当引咎自责的。

在这本集子里，对我的早年的作品，只选了一篇《水葬》。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本来打算通过一个农村暗无天日的事件来控诉地主政权的残酷罪行，由于我的思想认识水平很低，把佃户骆毛心里蕴藏的反抗情绪还写得很不够；想不到鲁迅先生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时候，竟选了我这篇处女作，说我写出了一点“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这是因为鲁迅平常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一种不可抵制力量，恰好他看见一个作者描写了这方面，他又是最肯培养文艺青年的，当然要鼓励（也是鞭策）两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文艺导师，我把它保留下来了。其他各篇，都是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习作中挑选的。虽是自选，我也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取舍未必全都适当，有些应选的小说并没有入选，有些次品反而选上了，这都是可能的。这本选集的作品还不大成熟，我想，如果作为史料来看，让青年读者们认识一点旧社会的罪恶和当时边远省区人民遭受的疾苦，多少还是有些益处。我记得高尔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青年们不大熟悉可恶的旧时代，因此他们往往对现在重视得不够。”今天，经过三年的拨乱反正，我国各条战线已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封建势力的残余还在影响着 我们，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干净、彻底清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必须严肃批判，官僚主义也要大力克服。在这个时候，读点反映旧时代的东西，把新旧社会对比一下，我们的爱憎不就会更加分明一些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历了不断的前仆后继的战斗，克服了无数的险阻艰难，从旧社会走过来才不过三十年，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已经跨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新的长征。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29日）

感 受·理 解·表 达

——关于《乡场上》的写作

何 士 光

作为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山花》的同志要我写一点写作短篇小说《乡场上》的体会；我写下这一点感想请同志们批评。

我想引一段话来作为开始，这是甘肃一个年轻的农民写在信里的。“……我一口气读完您的《乡场上》，清晰地感到：梨花屯就是我们的村庄，从某些方面来说，那胆怯、憨厚、勤劳、善良的任老大一家，就是我的家，那阴险、狡猾、奸诈的曹支书，仿佛就是我家门旁之户，那依仗权势、任性所为的罗二娘，好象就是我家门旁之妻，……感谢您锋利无情的笔彻底揭示了曹支书那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用心；感谢您替罗二娘式的农村之宝画出了她形象逼真的狼 狈 象；感谢您‘替农民说话’……当我把您的这篇作品介绍给我们全家时，他们欣喜地读着、笑着，还特意要我给您写信，就说：我们‘梨花屯’的所有‘任老大之家’，还有冯么 爸 向您感谢、祝愿，祝愿您勇敢地、更多地写出我们‘梨花屯’的真实情况……”

请同志们原谅我连“感谢”这样的字眼也引下来了。读着这封信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却原来”“普天下被压迫

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可是，说什么“替农民说话”呢？这些年来，我一家四口，岳母是农民，妻子是农民，一个小女孩也是农民，另外，亲戚朋友也无不是农民。这能说“替”吗？擦一擦眼睛我又再读一遍信；这是真的吗？我的一支笨拙的笔使得一家农民欣喜了吗？……有人嚷过“农业不过关死不瞑目”，那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我呢，哪怕只有这样一次使得一户农民高兴了一回，死的时候也愿意瞑目了，因为我的力量本来就这样小、这样小！……文艺这一社会现象，象屠格涅夫说的那样，是人的本性之一；人们总是在用造物给自己的嗓子喊叫；在文艺的长河中，固然，苦心孤诣的奉承是有的，饱食终日而无病呻吟也是有的，一心要把它当成敲门砖的也大有人在，但更多的人却绝不这样！“肃肃鸛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这样的作品，怕不是为了登大雅之堂才写出来的。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的痛心疾首的呐喊，不幸却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梨花屯”乡场上的好写照。“运动”没完没了，庄稼欲做不能，父母衣食无望，除非甘愿当“反革命”，我们冠冕堂皇的“贫下中农”还不能对着苍天呼叫“曷其有常”！……不，用不着我来一一地列举那些人所共知的、荒诞野蛮的、注定要被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不齿的事实；我重复地说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这儿的乡亲们这些年来是怎样的身心交瘁，早就渴望着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把心里的感受，把对过往的日子的恨和对现今的改革的爱喊叫出来。我的嗓子实在无力得很，这我自己也清楚，但人世间有乔木也有野草，我就倾其所有好了。

喊叫，当然最好不是直着脖子喊叫。“故国三千里，深宫

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惟愿喊出的是一声“何满子”。爱和恨追逼着人，这就迫使人想喊得更准确。只有理解得深切才能喊叫得准确。过往的日子象恶梦一样怪诞，却又如石头一样真实，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在那些日子里，我曾为这一点，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本本……说来也难以叫人相信，问题在于，我们以“一大二公”为骄傲的生产关系，明明与我们山区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不仅不相适应，还致命地摧残着生产力，使其到了命在旦夕的地步，而我们的一些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坚决不承认，对此讳莫如深。当然，这很难承认，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承认的事情不等于不存在，闹到后来，事情终于到了要“用专政的形式来办农业”的地步。这就是说，离开了这种“专政”，离开了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离开了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法西斯化的手段，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就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生产的领导者们就被绑在这架战车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这种“专政”，不得不没年没月地去“纠”去“整”，仿佛他们完完全全地是为了阻挠和破坏社会生产而存在的。当然，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愈益尖锐的矛盾不愿正视，就只好求助于大修水利啦，坡土改梯田啦，稻麦两熟啦，求助于这些心血来潮的灵丹妙药，正好象病急乱投医，明明要开刀却盼望一张膏药，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起死回生。要是这些“大批促大干”真强迫农民干了一些有用的劳动，也还让人多少有一点想头，但这些膏药又多是逼着农民上山去开石头，下水去种麦子，使已经疮痍满目的躯体溃烂得更厉害，而买这些膏药的钱又还得从农民的身上榨出来。在我们这里